

香港傳真

中信泰富政治暨經濟研究部
中國稅務雜誌社綜合研究組

No. 2007-19

2007年4月2日

我的極左經歷

炎黃春秋雜誌社 吳思

假如四人幫在權力爭奪中獲勝，極左派的命運會有什麼不同？

儘管高層權力鬥爭風雲變幻，最終決定一種社會理想成敗的，還是它在社會基層的可行性。極左派在文革中推行的農村政策是：農業學大寨，普及大寨縣。大寨模式可行，極左派的理想就可行。大寨模式行不通，極左派早晚要退出歷史舞臺。

文革末期，我在學大寨的最前沿，在極左翼，向更左的方向衝鋒，親身體會到極左派前進的艱難。極左派名聲不好，他們的視角很少被顧及。不過，我在左翼受挫的經歷，對我理解晚年毛澤東的失敗和中國極左勢力的衰落大有幫助：我的焦頭爛額之處，也是他們舉步維艱之地。

一、義務勞動受挫

下鄉插隊之前，我在中學當了幾年團支部書記，按照列寧在《偉大的創舉》中的教導，多次組織過“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”。到農村後，我接任第三生產隊的團小組長兼青年突擊隊隊長，又把“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”搬到了農村。

我們村口的南山上有一片荒坡，第一次義務勞動就是在荒坡上刨坑栽樹，建一座“共產主義青年梨園”。1976年4月一個星期六的傍晚，收工之後，我們青年突擊隊40來人義務勞動兩個小時，種上六、七十棵梨樹。這是我們村歷史上頭一回搞義務勞動，大家很好奇，連在校學生也跑來參加。效率高，幹勁大，挑水爬坡都是一路小跑，義務勞動大獲成功。

初戰告捷，按照當時的俗套，我作《流汗歌》一首，發在黑板報上。詩寫得很矯情，把符合正確路線的一分情緒誇張地感受為五分，表達為十分，努力自我感動並感動別人。

在勝利的鼓舞下，我又有了更宏大的設想：將不計報酬的義務勞動，從每週一天逐步增加到兩天三天，最後取代有報酬的勞動。在我們生產隊，然後在我們村，率先實現共產主義的勞動分配形式。這種設想的理論基礎是：按勞分配是一種“資產階級法權”——給多少報酬出多少力，以人們的私心為基礎，助長僱傭勞動思想。不計報酬的義務勞動才是真正的共產主義萌芽。我的計劃比大寨還要左。大寨當時的勞動報酬形式是“一心為公勞動，自報公議工分”，被後人譏為“大概工”，但勞動報酬與勞動態度和勞動成果多少有一些關係，因此就殘留了僱傭勞動的痕跡。我打算消滅這點痕跡。

一週後，我組織了第二次義務勞動，人數稍減，但幹勁也不小，補栽了30多棵梨樹，給上次栽的樹澆了水。公社廣播站很快就在

大喇叭裡表揚了我們青年突擊隊，還提到我的名字。

第三、四次義務勞動，分別給蘋果園和梨園澆水。衆人的新鮮勁漸漸消退，參加者越來越少，有事請假的越來越多。列寧在《偉大的創舉》裡提出過一個設想：共產黨在取得政權之後，如何判斷入黨積極分子的動機是否純正？他建議把“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”作為一面篩子。經受住半年以上考驗的，才能吸收入黨。黨員經受不住考驗的，還可以清除出黨。這個想法當然不錯，可是，把這面篩子用到我們生產隊，恐怕過不了多久，篩子上邊就剩不下幾個人了——說不定只剩我一個。進一步說，我這個剩下的孤家寡人，動機是否純正仍然成問題：我能經受住較大的考驗，到底是因為我熱愛勞動或熱愛人民呢，還是因為我有更大的野心？

一天晚上，我召開團小組會，討論義務勞動中出現的問題。我猜想，大家的新鮮勁過去了，再往下走，必須調動蘊藏在青年心中的更深刻的精神力量，啟發大家的覺悟，讀書學習，思考人生的意義，樹立人生榜樣，等等。沒想到，這個會成了對我的批評會。幾位團員在會上聯合指責我，說大夥熱情衰退的主要原因就在我身上。我利用了大夥，幹活是大夥出力，出名卻是我個人的。大家不願意繼續被我利用，成為我撈取個人榮譽的工具。

這種指責是有道理的。畢竟公社大喇叭只點了我一個人的名字，其他人的面目模糊為一個集體。從結果看來，我迅速得到提拔重用，這種說法也可以得到支持。但利用大家撈取個人榮譽確實不是我的初衷，至少我沒有意識到這種動機。我意識到的就是前邊描繪的宏圖大略。至於我想在實現宏圖大略的過程中撈取什麼私利，這一點不妨討論，我也有興趣加深自我認識，但我肯定不認那筆小賬。我的抱負或野心沒那麼小，不在乎大喇叭表揚之類的蝸角虛名或蠅頭小利。穩定軍心，穩住陣腳，哄著大家死心塌地跟我走，更

符合我的長遠利益。

問題在於，我不在乎，人家卻覺得虧了，而且是精神物質雙雙虧損。我剛來，根基尚淺，會上沒有一個人替我說話。

按照黨團生活會的規矩，我必須先做自我批評。我很想在自我批評之後發動反擊，說他們試圖逃避義務勞動，用對我的指責掩蓋自己的懶惰和自私，掩護自己臨陣脫逃。但是爭吵起來，公開決裂，以後的義務勞動就更難組織了。這種仗只能由別人替我打前鋒，我本人出面屬於赤膊上陣。於是，我更加廣泛深入地徵求了大家的意見，做了自我批評，深挖了個人名利思想，重新部署了黑板報小組的宣傳工作，請大家今後對我多多批評監督。原定議題取消，下一次義務勞動也沒有安排。

幾天以後，我被任命為生產隊副指導員，進入生產隊領導班子，團內職務由別人接任。我的極左宏圖也不了了之。

我感覺鬆了一口氣。當時有一句話流傳頗廣，據說還是毛主席說的：“在命運的迎頭痛擊下頭破血流但仍不回頭”，我把這句話抄在日記本上自我激勵。這次及時的提昇，免去了我預感到的一連串頭破血流的失敗。

當然，這種分析已經是事後諸葛亮了，那時我並未深想。現在深究起來，我感覺鬆了口氣，就是因為我朦朧地感覺到，“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”這棵幼芽在我們團小組內難以存活，更長不大。這還沒涉及什麼大東西呢，無非是一兩個星期拿出兩個小時，還有公社大喇叭裡的那點榮譽分配，同志們已經擺出一副決裂的架勢。這點東西尚且不能承擔，一旦人數擴充到整個生產隊，時間擴大到每週三五個工作日，關係到半數以上物質利益的分配，那時，列寧在《偉大的創舉》中寄以厚望的“勞動群眾本身自由的自覺的紀律”，又如何擔當得起？我們心裡究竟存在多少支撐這種自覺紀

律的“偉大的英雄主義”？

列寧指望那種奮不顧身的英雄主義能夠戰勝小資產階級的利己主義，在革命精神基礎上建立的勞動組織能夠創造更高的勞動生產率，因而取代資本主義。但在我發動的實戰中，不過幾個回合，英雄主義就敗於利己主義，青年突擊隊也面臨散夥的危險。當然，將來我可能更老練，根基更穩固，大權在握，手下有人打前鋒，還可以動用強制手段，讓反對者不敢說一個不字。不過，在那種情況下，維繫義務勞動的還能算“自由的自覺的紀律”嗎？

二、向自留地讓步

我第一次和貧下中農打架是在1976年5月上旬。生產隊的麥子正在澆灌漿水，社員自留地的土豆還在旱著。誰澆誰不澆、早澆或晚澆，與收成關係甚大。當時隊裡的三級揚程水泵老出毛病，我敢拆敢修，又是生產隊副指導員，便由我負責帶著一幫社員日夜輪班澆麥。

我主張先集體、後個人，集體的麥子不澆完，不向自留地供水。

在“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”看來，自留地是資產階級法權在所有制領域的殘餘，在此基礎上，小生產經常地、每日每時地、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，必須時時加以限制。我信奉這套理論。

開頭幾天，有一些社員向隊委會提意見，抱怨自留地澆不上水。指導員和隊長向我轉達了意見，我用幾句大話將他們頂了回去。但形勢一天比一天嚴峻。渠道常被扒開，社員偷偷截水澆自留地。有一回，麥田裡的社員很久等不來水，順著渠道巡上來，發現有人扒水又不敢制止，就找到我，說斷水了，讓我查查原因。我順著水渠往下走，看見大隊書記的嬖子在扒水澆自留地，就上去訓了

她一頓，堵上口子。她罵我禍害貧下中農，我罵她給貧下中農丟臉，偷大夥的東西。這種事情時常發生，澆麥進展緩慢。

為了打退小生產的進攻，我發動了輿論攻勢。我借助團支部的力量，召集本隊團員和青年積極分子開會，討論用水中的兩條路線問題，還在黑板報上發表小評論：〈危險的口子〉，再通過大隊的大喇叭廣播出去。

這種從報紙上學來的招數不太管用，夜裡總有扒口子的人。我在明處，扒口子的人在暗處，再說我也不可能一天 24 小時不間斷地巡渠。負責澆麥子的社員怕得罪人，既不巡渠，斷水了也不報告，我陷入了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。

再往後，澆不上水的社員愈發急了。一天下午，我在巡渠時看見一位年近 40 的正牌貧農扒水澆自留地。我過去制止，他先說好話，不管用，便罵我不顧貧下中農的死活：“你們知青有飯吃，就往死裡整我們貧下中農！你乾脆一鐵鍬劈死我得了！”說著還伸過頭來。我看說空話沒用，便自己動手堵水渠，我堵一鍬，他扒一鍬，你來我往，演變為推推搡搡，我腳下一滑，一個趔趄跪在一塊尖石上，當時膝蓋就腫起來了。那漢子怕事，立刻住手，倉皇退走。我又一次得勝，一瘸一拐地回去了。

我摔癱了的故事很快就傳開了。於是，大隊書記出面，召集貧下中農協會開會，眾人紛紛發言，痛斥那位扒水的貧農：你爹咋死的？忘啦？他父親看見日本鬼子進村，心裡害怕，拼命往家跑，日本人讓他站住，他照跑不誤，結果讓日本兵一槍打死了。那會兒你咋不敢鬧？現在，人家北京知青到咱山溝來，受這麼大罪，還不是為了咱們好？你倒敢鬧啦？如此這般。那貧農點頭哈腰，態度誠懇，連聲認錯。大隊書記給我撐直了腰，做足了面子之後，當場任命我為貧協小組副組長。

我當時多少有些疑惑，貧下中農協會這麼有威信？憶苦思甜這

麼管用？我們打起來他都不讓步，一提他父親的死因立刻就覺悟了？後來，處理過幾次類似衝突之後，我才明白他真正怕什麼。按照村裡的常規，兩人動起手來，一旦有人受傷，就可以讓對方賠一筆醫藥費和誤工補助，外帶探視賠禮必須攜帶的點心匣子。看不出傷來，尚且要裝病開藥訛他一筆，像我這樣膝蓋腫得老高，換了普通社員，至少要扒他一兩個月的工分。我是知青，如果回家休養，再加上路費，那費用就更沒譜了。

事情鬧大以後，一直不愛管事的指導員也召開隊委會，專門研究用水問題。我說了自己的觀點，主張先集體後個人。隊長並不和我正面爭論，他說我的主張是對的，但毛主席讓我們關心群眾生活，貧下中農的吃菜問題也應該重視。再說，分給社員自留地也是毛主席的政策，地分給人家了，就不能不讓人家種，不能不讓人家澆水。他建議白天集體澆麥子，夜裡社員澆自留地，誰先誰後，由抓鬮決定。隊委會七個成員，六個同意他的意見，我只好少數服從多數，下級服從上級。

話說回來，我不服從又能怎麼樣？腿腳靈便時尚且把不住水，現在癩了，我更不能不識抬舉，與所有人為敵。

後來，我當了生產隊的一把手，有權一個人說了算了，再遇到類似的情況，照樣被迫讓步。假如不讓步，迫使人家執行我的命令，就等於逼著人向我辭職。我們生產隊方圓五六里，溝壑縱橫，數千棵乾鮮果樹，大大小小數百塊糧田，哪面坡上的哪棵樹果子該摘了，需要幾個工，哪塊田該鋤了，需要幾個工，這些知識我不懂，沒有多年經驗的積累也休想掌握。隊長一撻挑子，我就抓瞎了。就算我本事大，什麼都懂，我也只能帶一撥人幹活，其他生產小組，老人婦女和各種專業隊，如果沒有幹部招呼著，衆人能在地頭一坐一整天，根本就別指望出活兒。我本想讓社員多為集體做貢獻，如果幹部撻挑子了，大家全在地頭坐著，豈非求益反損？

三、自留地變遷史

自留地一直是農民與極左勢力較勁的邊界。

從 1955 年底開始，毛澤東掀起了“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高潮”，大量初級社轉為高級社，農民的土地歸了集體，但保留了一段小尾巴：高級社抽出 5% 的土地分給社員種植蔬菜。這就是自留地。

1958 年 8 月，毛澤東在河南新鄉七里營視察，說“人民公社好”。8 月 29 日，中共中央通過了《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》，決議寫道：“一般說，自留地可能在併社中變為集體經營。”小尾巴於是歸了大堆。一些主張保留自留地的幹部，例如河南省委書記潘復生、楊珏和省委副秘書長王庭棟，被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傾機會主義集團。

1958 年秋收之後，主要農產品供應全面緊張，毛澤東開始糾左。1959 年 7 月廬山會議之前，中共中央已決定恢復自留地。廬山會議批判彭德懷的右傾機會主義，糾左中止，極左派得勢，直接導致了三年大饑荒，數千萬農民餓死。大饑荒末期，李先念看到河南省信陽地區光山縣人人戴孝、戶戶哭聲的慘狀，評論說：“如果把自留地堅持下來，小自由多一點，即使是反革命破壞，人也要少死好多。”

1960 年 11 月 3 日，在大饑荒籠罩全國的危急時刻，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的《緊急指示信》，第五條說：“允許社員經營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規模的家庭副業。”自留地、自留畜、自由市場，再加上生產隊內部實行的小包工，這就是文革中被稱為“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”的“三自一包”。

1962 年 9 月 27 日，中共中央通過《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》（農業 60 條），第 40 條說：“自留地一般佔生產隊耕地面積的百分之五到七，歸社員家庭使用，長期不變。”至此，自留

地制度基本穩定下來，直到大包乾在 20 年後將所有集體耕地都變成“自留地”。事實上，萬里在安徽農村搞大包乾的時候，趙紫陽就在四川農村擴大自留地。一是內部瓦解，一是外部蠶食，兩條路殊途同歸。

1964 年，毛澤東發出“農業學大寨”的號召。山西省昔陽縣大寨大隊 1963 年遭遇洪水，自留地全被沖毀，陳永貴乘機取消了大寨的自留地。

1970 年，山西省昔陽縣宣佈建成大寨縣。這一年，昔陽全縣取消了自留地。

1975 年 9 月，第一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召開，華國鋒代表黨中央國務院作了《全黨動員，大辦農業，為普及大寨縣而奮鬥》的報告。我就是鋪天蓋地的“普及大寨縣”的口號中下鄉插隊的。

在這場歷時 20 多年的較量中，我一入場就站在農民的對立面。我很想砍掉自留地，如果有這種力量的話，我絕不會手軟。因為，我在理論上相信自留地是惡的根芽，可能導致成千上萬革命先烈的鮮血白流。很久之後我才知道，自留地本身就是數千萬農民的非正常死亡換來的，取消自留地意味著數千萬農民白白餓死，卻沒有換來一種有助於減輕飢餓的制度。對照這面歷史的鏡子，我才看清楚自己那副無知者無畏的嘴臉。

我對自留地在理論上的厭惡很快就得到了生活經驗的充實。每天我都切身感到自留地如何與集體爭水、爭肥、爭勞力、爭人心，我完全理解大寨取消自留地的動機：迫使每個社員把全部身家性命押在集體上，斷絕所有後路，造成破釜沉舟背水一戰的格局——要麼愛集體，要麼沒飯吃。這是資源和人心爭奪戰逐步昇級的必然走向。在這個意義上，極左派“割資本主義尾巴”、“寧要社會主義的草，不要資本主義的苗”之類的邏輯並不荒謬可笑。針尖大的洞，碗口大的風。千里之堤，潰於蟻穴。不堵住漏洞，“社會主義

集體經濟”的日子很不好過。

問題在於，我心有餘而力不足。不依託高層發動的全局性攻勢，我不僅無力消滅自留地，就連卡自留地半個月的水也卡不住。

四、社員激勵機制的缺口

農民對集體大田和自留地的親疏是可以計算的。

剛插隊的時候，我對農民普遍偷懶的現象很不理解。按照當時的意識形態信條，工人農民愛國家愛集體愛社會主義，不應該偷奸耍滑。我問一位貧農為什麼不好好幹活，他反問道：“有我多少？”這話我聽見了，但沒有往心裡去。十幾年之後，我才領悟了這句話的深意。

我們第三生產隊有 57 戶人家。假設每戶人口勞力相等，在集體的大田裡，我刨 57 鎊，才為自家刨了一鎊。反過來說，我偷懶少刨 57 鎊，自家才損失一鎊。這種體制極其有效地激勵偷懶，同樣有效地懲罰勞動。自留地則不然。那裡的每一鎊都是為自家刨的，真所謂多勞多得，少勞少得，不勞動者不得食。對我們生產隊的社員來說，自留地對勞動積極性的激勵效率是生產隊的 57 倍。結果，自留地和庭院僅佔總耕地面積的 7% 左右，但社員像繡花一樣精心伺候，每年收穫的煙葉、糧食和蔬菜，價值將近家庭總收入的 3~5 成，能與生產隊 90% 多的耕地分庭抗禮。

我們生產隊的激勵效率只有自留地的 57 分之一，這還算好的。1958 年人民公社興起的時候，規模動輒萬人，連生產隊和大隊的幹部都不用對勞動成果負責，結果鬧出了一場大饑荒。饑荒迫使極左派撤退，在“人民公社三級所有、隊為基礎”一線構築防禦工事，同時伺機反撲。大寨大隊和昔陽全縣取消“三自一包”，實行大隊核算，又把前沿推進到以生產大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中線陣

地。大寨大隊 80 戶人家，從物質刺激的角度看，其激勵效率只有自留地的 80 分之一，還不如我們生產隊。

總之，如果把自留地比作社員的親兒子，集體大田就是 50 竿子甚至 80 竿子打不著的遠親，其疏遠程度如同陌路。

大寨模式在激勵機制方面存在如此巨大的缺口，農村基層幹部如何彌補呢？常用的辦法有三種。

第一種，以身作則，道德感召。

普通社員刨 57 鎊，我刨 87 鎊、107 鎊。我讓你們佔我便宜，你們好意思嗎？有不好意思的，自然會多刨幾鎊。大寨的陳永貴，大寨大隊的幾個黨支委，尤其是賈進財，都是這麼幹活的。這種感召是有效的，只是效果不那麼可靠——它不僅依賴幹部行為的感召力，還要依賴衆人良心的敏感程度。

我和附近公社的一位先進知青聊過這種作用最佳狀態。他講了一個故事。他們公社有一個村，隊長幹活拼命，為了集體不顧家，結果和老婆打架，老婆喝農藥自殺了，丟下四個孩子。他們隊裡的社員特別感動，不用招呼就出工，幹活全不惜力，誰偷懶大家就罵他沒良心。收工後大夥還輪著去隊長家帶孩子，替他種自留地，幫他家打的柴禾堆了一房高。我們兩人唏噓之下，笑歎自己沒有老婆，想感動大家不知還要等多久。

第二種，思想教育。

思想教育也有兩個層次。所謂提高階級覺悟，無非是讓衆人認清自身利益與集體利益和國家利益的一致之處。這種以物質利益為基礎的教育，說到底，避不開一鎊與 57 鎊的關係問題。算得越透徹，偷懶越有理。假如人家偷懶而我不偷懶，一位社員反問我：那不是讓人家剝削了嗎？這是第一個層次。在這個層次上我們算不贏偷懶的社員。

第二個層次，倡導“愛國家愛集體的共產主義風格”，創造共

產主義新人。毛澤東試圖培育出毫不利己、專門利人、公而忘私、大公無私的共產主義新人，“對工作極端地負責任，對同志對人民極端地熱忱”。

在蜜蜂和螞蟻的社會中，這種個體確實存在，但一個社會性昆蟲群體其實只是一個繁殖單位，近似於人類的一個家庭，而不是血緣關係疏遠的一個生產隊或一個村莊。工蜂工蟻與本群體姐妹的基因重合率達到 75%，而人類的父母與兒女之間、兄弟姐妹之間的基因重合率不過 50%。螞蟻蜜蜂的獻身精神是有生物學基礎的，正如人類對家庭和親人的關愛也是有生物學基礎的。擁有這種利他精神的物種可以在進化中獲得競爭優勢，從而保住甚至擴大自己的基因分佈區域。極左派鼓吹以社會階級為基礎的獻身精神，而社會階級並不是遺傳繁殖的基本單位。極左派的這種企圖，簡直就是要創造一個連“造物主”也不知如何設計的新物種。

當然，毛主席說了，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。人類確實有一種精神力量，問題在於，在激勵機制的缺口中，這種精神力量頂得了多少鎊？頂三五鎊還是 57 鎊甚至 80 鎊？在我們生產隊，平均而論，這種不在乎回報的純精神力量，似乎連三五鎊——缺口的 7%——也頂不上。極左派堅決反對一切利用人類利己之心的政策，說那是調動私心，因此狠批物質刺激，禁止各種承包制度，迫使基層幹部集中力量創造共產主義新人。如此極端的政策，固然符合兩種激勵機制的競爭逐步昇級、走向破釜沉舟的邏輯，但也意味著關閉 93% 的能量，依靠 7% 的能量推動農業生產。結果，產品嚴重匱乏不說，在我的感覺裡，那 7% 的精神力量也被折騰得筋疲力盡，歷盡摧殘之後，剩下的還不足 3%。

第三種，政治壓力。

所謂政治壓力，對我來說，主要體現在大庭廣眾之下訓人。大家幹活的時候，如果有人站著聊天，半天不動彈，我就吆喝一嗓子：

“動彈啦動彈啦，要聊回家聊去！”再嚴重點，就在出工前不點名地警告一番。“有人思想成問題啊。我數了，一上午鋤草不到二百下！一分鐘還鋤不了一刀！給誰幹呢？給你自己幹呢！你偷懶，不是剝削大夥嘛！再不自覺，咱們就拉出來說說！”如果有誰反抗，頂嘴帶髒字，我就狠狠扣他的工分。我對社員如此兇悍，以至我們隊的小孩哭，當母親的會拿我來嚇唬孩子：“哭，哭，再哭吳思來啦！”

當然，作為平衡，也要經常表揚勞動態度好的社員。

保持政治壓力，我認為是填補缺口的主要手段。以我們生產隊而論，那 56 鎊的缺口，假如以身作則和道德感召的力量可以補上六鎊，思想教育可以補上四鎊，政治壓力就可以補上 16 鎊甚至 20 鎊。於是 26~30 鎊有了著落，剩下的 26~30 鎊則難以彌補，體現為怠工造成的淨損失。

這種估計，用來解釋大寨，肯定低估了政治思想工作和幹部帶頭作用的力量。大寨的社員很少怠工。但用這個比例解釋我們生產隊，解釋全國的情況，未免過分樂觀。大包乾之後，農村勞動力大量外出，留在家裡的人，勞動質量明顯提高，勞動時間卻大大縮短，由此可見，公社體制下怠工的淨損失不止一半。

八億農民怠工，中國受不了，全世界都受不了。極左派解決不了這個問題，沒有能力彌補激勵機制的缺口，就守不住集體經濟的陣地，更別提繼續前進了。

五、幹部激勵機制的缺口

算到這會兒，一個新缺口出現了：那些以身作則、進行思想教育、維持政治壓力的幹部，他們的動力來自何方？普通社員激勵機制的缺口靠他們勉強補上了一半，但在這一半的背後，補缺者自身的激勵機制，也是千瘡百孔，隨時有瓦解的危險。

我當生產隊指導員的第一年，平均每兩個月，生產隊長向我辭職一次。其他五位隊幹部也穿插其間。撻挑子的原因很多，為了省事，仍舊以水渠為例。

有一天，大隊書記的堂兄忽然將通過他房後的水渠拆毀，幾十畝麥田的封凍水沒法澆了。他說水渠滲水，把他家的房基涸了，要求隊裡挖地三尺，用水泥澆築這段水渠。我們去他家看了，一絲水痕也沒有，為了這種莫名其妙的擔心，就要斷水半個月，大量耗費貴如麵粉的水泥？生產隊長認定大隊書記支持他堂兄刁難自己，立刻找到我，宣佈辭職。

這位生產隊長年近 50，是個心高氣傲的人，農活很好，自留地和庭院收拾得妥帖至極。他看前任隊長一而再、再而三地撻挑子，什麼事也扛不住，多次耽誤隊裡的農活，心裡有氣。所以，我請他出山，一探口風就覺得有戲，按常規三顧茅廬之後，他就接手上任了。沒想到剛上任就遇到了這種挑戰。

拆水渠的漢子大約 36、37 歲，精靈鬼怪，好講三國，是我們生產隊的人尖子。新隊長也是人尖子，便有了幾分競爭關係。新隊長不肯受他的氣，所以一遇挑戰便派人去硬修斷渠，那漢子乾脆往斷渠上一躺：要動傢夥就往我身上招呼。派去修渠的石匠自然不肯為了隊裡的事打架，就找了隊長，隊長又氣哼哼地找到我，說這是受大隊書記的指使，沒法幹了，宣佈辭職。其實他誇大了挑戰的來頭。大隊書記私下跟我說過不少新隊長的好話，請他出山當隊長也是大隊書記的建議。

我上門問那鬧事的漢子，為什麼早不鬧晚不鬧，隊長剛上任就鬧，是不是對人家有意見。漢子說，早就想鬧，看前任隊長溜肩膀，怕嚇著他，就忍到現在。新隊長不是本事大嗎，怎麼也這副德行。現在想來，這話其實也是鬥氣。莊稼急用水的時候他不敢斷，怕激起眾怒。莊稼不用水的時候，我們又不怕他斷。澆可有可無的越冬

水之時，最是打劫的好機會。結果，僵持數日，經過四五次往返談判，鬧事的漢子放棄挖地三尺的要求，只要用細水泥把他屋後這段水渠抹上一層，就容許過水了。

此事解決了，隊長的心卻涼了，死活不肯再幹。於是，我又拿出對付前任隊長的老辦法，吃過晚飯就到他家做“思想工作”。其實也沒什麼可說的，翻來覆去就那麼幾句話：“大夥的事，都不幹誰幹呢？你也不幹我也不幹，秋後大夥喝西北風？”然後就端過他家的煙筐籬捲大炮，喝他家的茶，有一搭沒一搭地閒扯幾句，每天熬他到半夜，按照常規，熬到第五、六天，再堅決的人也會答應繼續幹。遇到特別頑固的情況，我還會拉上其他隊委會成員，甚至拉上大隊書記，一起做他的思想工作，一起去熬他，輪流去熬他。

按照左派的革命邏輯，幹部幹部就是先幹一步，除了責任義務和指揮別人的榮耀，當幹部幾乎沒有物質方面的好處，全憑革命精神的支撐。在那 57 鎊裡，他們只有一鎊，但他們卻要晚上開會，處理瑣事，白天操心安排農活，帶頭多幹，督著別人多幹，不時還要幹點堵人財路的事，得罪幾個路子多的能人。這就意味著，他們付出了兩到三鎊，所得只有一鎊。他們讓普通社員搭了便車。

當然，幹部偶然也能在招工招生等好處出現時優先一把，但那不是主要因素。如果特權多、待遇好，就像大公司高薪僱傭管理人員一樣，也可以構成強大的激勵體系，但這條路與文革的理想背道而馳。當時正在抓“黨內資產階級”，“新生的資產階級分子”，主要罪狀就是利用特權搞腐敗。衆目睽睽之下，那時的特權收益比現在少得多，在幹部比普通社員多付出的十鎊中，平均起來，特權未必能抵償兩三鎊，缺口依然存在。

地主和資本家都有足夠的動力監督雇工的勞動，正如雇工也想方設法逃避監督一樣。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，雙方對利益最大化的

追求構成均衡，維持著經濟的運行。但是，地主資本家監督管理的動力來自剩餘索取權，監督帶來的收益完全歸他們自己，虧損也要由自己承擔。這種物質利益的獎懲機制是有效的，但被視為資本主義道路。在大寨模式中，幹部監督管理的收益全歸大眾，他本人的收益主要來自精神和社會地位方面的榮耀。那麼，幹部的社會地位、當幹部的精神愉悅和指揮別人的榮耀能不能補償那些額外付出呢？這就因人而異了。

前任隊長，開頭覺得還能補償，幹得時間長了，榮耀和地位帶來的愉悅淡化了，就覺得難以補償了。幹得越久，與怠工和佔小便宜的社員的衝突就越多，對人性和自己的服務對象就越失望。最後，原來還有幾分的同情心和責任感消磨殆盡，輕蔑和憤懣越來越重。隊幹部找我撿挑子的時候，往往會撿下一句狠話：“這幫東西，餓死他們也不屈！”

新任隊長，支撐了大半年後，榮耀感同樣淡化了，對前任隊長缺少擔當的義憤消失了，兒子又進公社農機修配廠當了工人，繼續當幹部的利益相對下降，於是，遇到一點小麻煩就辭職了。最後我請出一位有殘疾的中年人接替他當了隊長。如果我繼續熬他，未必不能再使他撐半年，但我失去了熬他的興趣。

和那些辭職的幹部一樣，我對人們的一般看法越來越壞，溫情越來越少。開始，我希望自己和貧下中農打成一片，生活得彼此分不開，想他們之所想，急他們之所急，努力去熱愛人民。當幹部不過一年，有一天，偶然和其他公社的先進知青聊天，說到社員偷懶的現象，我咬牙切齒地冒出一句：“一群牲口，恨不得拿鞭子抽！”話一出口，心裡一驚。我這是怎麼了？本想熱愛人民，怎麼反倒滋生恨意？本想當人民的勤務員，怎麼心裡成了奴隸主？我隱約感到有什麼地方出了毛病。

六、反向改造世界觀

這又扯出了我心裡的一個漏洞。隊委會激勵機制上的缺口，由我這個一把手負責填補。我湊湊合合地補到 60 分及格的水平，但我心裡的缺口誰來補呢？

按照毛澤東在《紀念白求恩》中的要求，“對工作極端地負責任，對同志對人民極端地熱忱，”這個漏洞似乎可以自我填補。就好像餓了要吃、渴了要喝一樣，熱愛人民就去為他們服務，從而得到自我滿足。但在我的感覺中，這種純情感的東西，在與工農大眾的衝突中會逐漸冷卻，缺口越來越大。靠愛和情感補不上。

我們村流傳著一首順口溜：“大隊幹部搜，小隊幹部偷，社員縫個大兜兜”，描述了眾人踴躍佔集體便宜的場面。如此描述有些過分。我的印象是，在正常年景，五分之一偷，五分之三搜，五分之一不偷也不搜。每到偷竊收益最高的季節，隊委會就推出我當一個月的護秋員。我是外來的愣頭青，敢得罪人。幾個月護秋員幹下來，每天想賊防賊，練出了一雙賊眼。我每隔三五天抓一個賊，創造了我們村看秋歷史的最佳戰績。所謂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，就在這種檢驗和調整之中，我的世界觀悄然轉變。多年之後，我接觸到西方經濟學對人的基本假定：人們理性自利地追求利益最大化。這個說法讓我眼前一亮，好像揭去了看秋練出的賊眼的最後一片蒙子。

現在回首往事，我才意識到自己的世界觀確實得到了改造，只不過和毛主席指引的方向截然相反。在貧下中農的教育下，我的眼睛和眼中的世界徹底改變了，從醉眼陶然的一片粉紅，變得越來越像老鼠，善於在黑暗中發現利益和危險——賊眼賊亮。

回顧對農民感情的變化，我還有一個驚奇的發現：當年的憤恨現在又變成了讚賞。過去，意識形態教條把工農大眾描繪成精神最

乾淨、關心集體、大公無私的聖人集團，抬高了我的期望值，一旦失望就滋生恨意。現在，高調的意識形態轉變為人類理性自利的假設，期望值已經降低，對共產主義理想社會的憧憬也變成了對利益制衡體制的信仰。此時心態平和，把千方百計追求個人利益的行為視為當然，發現一點自我約束也知道珍惜。再看農民與統治集團鬥智鬥勇，包括當年與我鬥法，妙手連發，不禁欣賞起他們的反抗策略。由此看來，現實主義培養同情和溫情，理想主義反倒助長仇恨。

順便提一下，我對工人階級的感覺比對農民更糟糕。1974年，我曾在當時最革命的石油戰線當過一個月的翻砂工，發現工人們每天只幹三四個小時的活兒。我多幹了，就有熱心的師傅勸我注意群眾影響：你這樣幹可能提高定額，連累大家，群眾會對你有意見。後來我在大港油田幹活兒，以中上等速度幹兩個小時，師傅就過來制止我們，說一天的定額已經完成。我大惑不解：號稱最先進的領導階級為什麼也偷懶怠工？多年之後，我看到劉少奇在安源煤礦組織罷工的經歷，工人得勢之後，每天只幹半天活，整得公司承受不了。李立三在路口攔截工人，不許他們早下班，工人就罵他是資本家的走狗，還動手打他，氣得他大哭而去。劉少奇為此苦惱很久，還請教了來訪的美國共產黨領導人，大家都不知如何是好。

跳出馬列主義教條之後，我才鬧明白一個淺顯的道理：工人農民和地主資本家一樣，每個階級都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。這種互相衝突的追求構成均勢，社會因此正常運行。確實有自覺精神這種東西，但僅靠某個階級的覺悟和自律是不夠的。任何一家獨大的格局都會損害全局並最終傷及自身。這種來自生活經驗的認識就是我轉而信仰利益制衡體制的根據。

隨著世界觀的悄然轉變，我的浪漫情懷越來越淡，理性和算計深入骨髓，本來依靠理想和信念填補的缺口也進一步擴大。幹部當到第二年，我隱隱約約地意識到，自身力量補不上那二三十鎊的大

缺口。我對“農業學大寨”運動的前途深感悲觀。極左派描繪的共產主義理想越來越顯得渺茫。我開始懷疑繼續死撐下去的意義。

在真實的心理活動中，這個變化過程體現為拉鋸般的衝突。革命熱情逐漸冷卻讓我深感恐懼，便調動起全部力量與之對抗，精心呵護心中的每一顆火種，鼓起腮幫子吹出火苗。這時我寫出了此生最革命的幾句詩：“火紅的黨旗呼啦啦地飄！我們是黨旗上的鐮刀！我們的熱血在黨旗上燃燒！”我迫切需要用熱情的大話給自己加熱。

總之，靠精神力量或世界觀改造補不上缺口。那麼，靠行政昇遷如何？

如果像國營企業那樣，出色的管理者可以得到行政體系內部的昇遷，這當然是有效的激勵。不過，農村幹部能夠進入幹部系列的概率極低。大寨出了一個政治局委員，一個中央委員，這種概率，在全國上百萬個村莊裡，連 20 萬分之一也沒有。建築工人的年度死亡率是十萬分之八，這種死亡風險幾乎不在職業選擇的考慮範圍之內，而成為中央委員的概率還不到這種不值考慮的概率的 6%。對農民來說，成為公社幹部的機會也小到了不值考慮的程度。一旦昇官的概率低到一定濃度，激勵就不再普遍有效。反過來，撿挑子，爭取更多的閒暇，才是獲得福利最大化的策略。這也是農村基層幹部的實際選擇。

結論：幹部激勵機制的缺口，靠行政昇遷的路也補不上。

不過，這條路可以列入我的考量。我是知青，又是先進典型，從大隊領導昇到公社領導再昇到縣委領導的概率遠高於常人。我當時確實也如此預測自己的歸宿。問題在於，追求昇官的個人前程，還能算共產主義的人生觀世界觀嗎？我想走這條路，到底是為了對革命做更大的貢獻呢，還是為了個人的名利地位呢？我糊弄自己說，地位越高，對社會的貢獻越大，這是為了革命。但我懷疑自己

是自欺欺人，而且可疑程度超過六成。

假如毛澤東長命百歲，我在學大寨的道路上繼續走下去，我會變成什麼樣子？

如果沒有昇官，如果我和農民一樣需要養家糊口，大概用不了幾年，我的肚子就會告訴我什麼是真理。如果我因為學大寨積極而很快昇官，恐怕我會繼續與農民作對，加大向小生產進攻的力度，在更大的範圍內割資本主義尾巴。

順便插一句，我的昇遷完全是由上級領導決定的。甚至在入黨之前，公社副書記和大隊書記就找我談話，內定我為生產隊指導員兼大隊黨支部副書記，連群眾意見都不必徵求。繼續聽黨的話，繼續與農民作對，對我的昇遷有益無害。

如果我在明白是非之後昇了官呢？我會為了自己的前程昧著良心推行極左路線嗎？我會像安徽鳳陽縣委書記陳庭元那樣默許大包乾嗎？我不知道。官場也是改造世界觀的好地方。

七、臨陣脫逃

以極左的標準衡量，我的插隊經歷就是一連串的失敗。青年突擊隊的義務勞動首先受挫，以共產主義義務勞動替代僱傭勞動的夢想破滅。限制自留地或曰資產階級法權的努力以退讓告終。建立堅強的領導班子的企圖也一再失敗。屢戰屢敗之後，我失去了發動進攻的銳氣，和多數基層幹部一樣轉入守勢。

每年深秋，種完冬小麥後，縣裡都要開 20 多天的三級幹部會，簡稱“三幹會”。先在公社開，再轉到縣裡開，整黨整風，建班子。我連續參加了兩年，每年的重點都是解決幹部擻挑子問題。在全國範圍內，幹部激勵不足的問題普遍存在，年底便是幹部擻挑子的高峰。我們聽大量鼓動報告，接受上級給我們打氣，學習先進典型，

互相批評並自我批評，聽革命前輩訓我們沒出息，聽公社書記跟我們說好話，說大話，再集中解決幾個讓人灰心喪氣的難題。最後人人過關地表個態，承諾再幹一年。那麼，經過多年的篩選沉澱，什麼人留在幹部隊伍裡？

我們聽過一個生產隊長的報告，題目是〈當隊長有癮 搞管理沒夠〉。許多有管理偏好的人，當領導感覺輕鬆愉快的人，組成了生產隊幹部的群體。他們有個人特色的選擇偏好降低了當幹部的成本，提高了當幹部的收益。只是這種人比例很小，經過長期沉澱積聚起來，也未必能補上激勵缺口的兩三成。

各級領導竭盡全力，只能勉強維持這種均衡。這是學大寨運動維持不垮的最後一道防線。這道防線漏洞百出，但最高司令部一輪又一輪地動員發令，幹部隊伍像環環相扣的戰陣和各級督戰隊一樣挺在那裡，經受著八億農民海潮一般撲向自留地的正面沖刷，經受著農民和農村幹部大面積怠工在內部和背後的淘洗。

僵持之中，恢復高考了。

我曾經在公社大喇叭裡放出大話：“招工不走，招生不去，永遠扎根在貧下中農的心裡。”這句大話悄悄給昇官的前程留了一條路，卻完全堵住了進工廠和上大學的路。

一位和我同樣肩負重任的知青朋友勸我：“我試著扎根了，但我發現貧下中農的心裡是一片沙漠，你扎根其中也無法成活。”他考上了清華。可是我的大話餘音繚繞，報名高考無異自打耳光。我咬緊牙關，不理父母的請求，不報名，不復習，默默抵制了那年高考。夥伴們在考場中答卷的時候，我正爬在樹上打核桃。秋色西來，天高雲淡，我胸中激蕩著自我犧牲的悲壯感。

1978年，社會大變動的各種跡象越來越顯著，大隊書記和公社負責知青工作的副書記先後找我談話，表示支持我參加高考。我表面上顯得不太情願，答應考慮考慮，暗自卻高興有這個就坡下驢

的機會。我自欺欺人地想：上大學也是為革命，本事大了可以對人類做出更大的貢獻。

1978年夏天我考上了中國人民大學，一所我認為最具理想主義和革命精神的學校。考分到達村裡的時候，正是護秋的季節。人們大呼小叫地找到我，說我的考分特別高。我半信半疑去大隊廣播室看了成績通知單，果然遠遠高於錄取線。我心中一陣狂喜，卻故作鎮靜，不緊不慢地踱回宿舍，提了鐮刀，按照往常巡山的路線出了村。走到荒僻處，終於按捺不住，一口氣跑上十幾層樓高的山梁，毫不氣喘，興猶未盡，又蹦了幾個高。平靜下來後，我為自己的反應大吃一驚，也為自己的大喜感到羞恥。我怎麼這樣？不是上不上大學無所謂嗎？我那麼想離開農村嗎？我還以為自己對農業學大寨的偉大事業戀戀不捨呢。由此我也得到了一條經驗：人們往往並不瞭解自己。

新鮮勁過去之後，我心底的羞愧露頭了，而且數年揮之不去。我食言了。我怕苦了。我臨陣脫逃了。同時我又感到大為輕鬆，真切體會到什麼叫“苦海無邊，回頭是岸”。我不必在一場預感到失敗的戰爭中苦苦支撐下去。

八、如今了然識所在

多年之後研讀明史，我注意到明朝初年和共和國初期的驚人相似。朱元璋也搞國有化，更準確地說是官有化，剝奪各個社會集團的權利，尤其是大地主大商人的權利，將盡可能多的資源集中在官家手裡，同時嚴厲約束各級官員，鼓吹道德教化。

順著這條軌跡上串下連，我獲得了另外一種眼光和感覺。我感覺自己當年很像朱元璋手下的酷吏。我們為了實現自己的社會理想，與各個社會集團對抗，儘量把所有的資源集中在官家手裡，努力清

除反對我們崇高理想的人們。我以為這就是社會主義，這樣就能建成共產主義，正如朱元璋以為這樣可以建立合乎王道的萬代基業。

資本主義，就是奪取皇家貴族的權力，由資產階級集體控制政權。社會主義，就是奪取資產階級的權力，由工農大眾控制政權。可是這兩種權力轉移均未在中國發生。我參與的事業，一方面是剷除資本主義萌芽，另一方面是控制驅使農民群眾，而不是被他們控制和驅使。這種官家說了算的體制，既不是資本主義，也不是社會主義，而是極端的官家主義。¹

官家主義因主張和信條不同，又分為多種類型。儒家信條在西方衝擊下敗陣之後，以趕超西方為目標的各種主張登上了歷史舞臺。我插隊的時候只熟悉其中的兩種主張。

一種是：官僚集團直接承擔資產階級的使命，管理生產，計劃經濟，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，物質刺激，利潤掛帥，把全國辦成一家大公司。這條路線被毛澤東斥為修正主義和資本主義。

另一種是：抓革命促生產，鬥私批修，創造共產主義新人和新世界，順便完成四個現代化，並一勞永逸地解決資本主義時代的其他問題。這種遠遠超出資產階級物質利益眼界的追求，就是毛澤東的理想。後人把這種理想稱為空想社會主義，空想固然不錯，社會主義卻大成問題。這裡根本就沒有農民之類的社會集團說話的份兒。

從官家主義的角度看，左派右派的分類，被超越歷史階段地過分強調了。前資本主義時代的官民之分，才符合我們的時代特徵——官民之分更能揭示當代的主要矛盾。所謂官，就是打天下坐江山的暴力集團及其官僚代理人；所謂民，就是農民和工商業者組成的生產集團。生產集團控制了暴力集團及其官僚代理人之後，勞動和資本的矛盾才上昇為社會的主要矛盾。這時候，左翼右翼之類與資產

¹ 吳思：〈置疑“權貴資本主義”〉，《鳳凰週刊》2005年第13期。

階級和無產階級相關的劃分，才從二級政治分類上昇為一級分類。如此看來，在官家極權的時代，我恰好在為強化官家極權、削弱農民勢力而衝鋒陷陣。可是，任何集團的勢力太大，和皇家貴族勢力或資本家勢力太大一樣，都是一種社會失衡，都將造成社會災難。

在新的歷史坐標系中，當年的困惑和迷茫消失了。如今了然識所在。中國兩千多年的帝國歷史就是官家主義的歷史。毛澤東時代，官家對社會的控制達到全盛的頂點，用自己的理想塑造社會人心的全方位努力登上了中國歷史的最高峰，並且憑藉強權打造了工業化基礎。“文革”之後，從農村到城市，處處民進官退，民間和官家勢力的新均衡即將重建。迄今為止，對這種新均衡的意識形態描繪和理解尚未定型，就連我在此使用的“官家主義”也是正在形成之中的概念，我們仍處於下一個均衡類型重建之前的探索和動蕩之中。

在官家集團真正成為公僕之後，我希望出現所有社會集團共同當家作主的社會，大家靠投票立法定規，我以為那才是名副其實的社會主義社會，或者叫“全民主義”社會——每個社會集團及其成員都有平等的政治權利，誰也不能憑藉暴力專別人的政。資產階級固然財大氣粗，但工人可以依靠工會與之抗衡；農民固然是一盤散沙，但可以憑藉農會分擔集體行動的成本，為本階級爭取更多的利益。為了保護喪失了勞動能力的弱者，消除拼命謀生的土壤，這個社會還應該設立最基本的生存保障體系。

倘若我夢想落空，代替官家主義的真是資本主義社會，立法定規全由資本家說了算，禁止組建工會，禁止罷工，憑藉暴力專工農大眾的政，那時候，即使我衰老不堪，我也要再當一回左派。這不是出於什麼階級感情，而是出於對利益制衡的信仰，出於對公道的信仰。公道自在人心。